

关于扬雄四赋作年的两个问题

易小平

摘要：论者通常将扬雄四赋的作年定于元延二年和元延三年。但此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为前提，二是对本传里“明年”二字理解有误，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混为一谈。只有充分尊重《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并认识到本传所说的“明年”并不是指成帝羽猎之明年，而是指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才能正确地考证出扬雄四赋的作年。

关键词：扬雄；四赋作年；两个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092-04

扬雄四赋包括《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和《长杨赋》，俱载《汉书·扬雄传》（下称本传）。关于这四赋的作年，有据的主要有两则史料，一是本传所载扬雄的自序：“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①按这里的《校猎赋》，《文选》因其序中有“羽猎”二字而名之曰《羽猎赋》，后人多沿用此名，但本文仍用其本名。二是《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宿萑阳宫，赐从官。”^②

根据这两则史料，论者通常将前三赋系于元延二年，而将后一赋《长杨赋》系于元延三年。如沈钦韩《汉书疏证》卷33“奏甘泉赋”注：“愚按《成纪》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据此传下云‘其三月将祭后土’，‘其十二月羽猎’，不别年头，则为一年以内之事。奏《甘泉赋》当在元延二年，与纪文方合。”^③沈氏系《甘泉赋》于元延二年，则与之同为“一年以内之

事”的《河东赋》、《校猎赋》也作于该年。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元延二年：“扬雄作《甘泉赋》，大病。又作《河东赋》、《羽猎赋》。”^④又三年：“扬雄作《长杨赋》。”^⑤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编年史》元延二年：“扬雄四十三岁，春正月，从成帝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三月，扬雄作《河东赋》以讽。十二月，扬雄作《校猎赋》。”^⑥又三年：“扬雄四十四岁，其秋，作《长杨赋》。”^⑦此说影响甚大，几乎成为定论。然而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

一、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是否成立

按此说根据《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和本传所载前三赋的序，认为《甘泉赋》、《河东赋》与《校猎赋》同作于元延二年（前11）；然后根据本传中“明年”二字，将《长杨赋》系于元延三年（前10）。可是这样一来，就与《成帝纪》元延三年的记载相矛盾，因为该年根本没有成帝从胡长杨大校猎的记载；同时，也与《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相矛盾，因为唯有该年对成帝从胡长杨大校猎有记载。为了消除这个矛盾，论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成帝校猎除了元延二年那次之外，还有一次在元延三年；而且他们认为，元延三年这次成帝才“从胡客校猎”，而元延二年那次“无从胡客事”。如《资治通鉴》元延三年胡注引《考异》说：“然则从胡客校猎当在今年，《纪》因去年冬有羽猎事，致此误耳。”^⑧如果成帝元延三年校猎存在的话，那

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22页。

②同上，第326页。

③沈钦韩《汉书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267册，第132页。

收稿日期：2010-01-05

作者简介：易小平（1972-），四川南充人。广西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汉魏文学。

④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⑤同上，第15页。

⑥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2页。

⑦同上，第285页。

⑧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81页。

么《成帝纪》为何没有记载呢？对此他们给出了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班固将元延三年校猎并入了元延二年校猎之中。如钱大昕《三史拾遗》说：“（元延）二年校猎无从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两事为一，则《纪》失之也。”^①另一种解释则是班固将之省略了，如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说：“至于纪、传的互异，实在是两回的校猎，本纪仅载二年冬的，雄赋却为三年秋而作。”^②

可见该说假设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校猎”的存在，是以否定《成帝纪》元延二年成帝“从胡客校猎”的存在为前提。按论者对前三赋作年的考证，以《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和本传所载前三赋的序为基础，可见他们对《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还是尊重的。不过当他们对《长杨赋》的作年进行考证时，却只据本传中“明年”二字就将之系于元延三年，而对实际上是确定此赋作年的唯一可靠史料——《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不仅全无尊重，而且还将其成帝“从胡客大校猎”的记载轻率地改为“无从胡客”的一般校猎：这显然前后矛盾。然而，如果他们前面对《成帝纪》元延二年的尊重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后面的不尊重就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后面的不尊重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前面的尊重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前面的尊重是错误的，则后面的不尊重也必然错误，因为他们后面对《长杨赋》的考证以前三赋的考证为基础。可见不论哪一种情况的自相矛盾，对《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的不尊重都是错误的。既然《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必须尊重，不容否定，那么以此否定为前提而提出的元延三年假设就成为多余，不能成立。

论者也许会辩解说，他们前面对《成帝纪》元延二年记载的肯定，只是对其中“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部分的肯定，而后面对该年记载的否定，只是对其中“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部分的否定，前后肯定和否定的对象并不相同，因此不能说互相矛盾。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从内容上看，他们所肯定的这部分文字是关于成帝并幸甘泉、河东两地的，他们据此确定前三赋的作年。而据《成帝纪》，成帝一年之中并幸两地的记载除了元延二年，还有永始四年（前13）、元延四年（前9）和绥和元年（前8）三次。既然成帝并幸两地的记载有四次，那么他们单据元延二年那次记载而将前三赋系于元延二年的观点，就只有四分之一的正确性而难以成立。另一方面，既然元延二年记载中关于成帝并幸两地的部分可以肯定，而不相关的部分可以否定，那么其他三次的记载岂不是也可以同样处理？推此以往，我们还可以以其他内容的相关或不相关为依据对《成帝纪》进行新的肯定或否定，其中包括成帝并

幸两地的记载。一旦成帝并幸两地的记载被否定，那么他们用来确定前三赋作于元延二年的依据将不再存在。以上两种情况都将使前三赋的作年重新变得不可确定，由此本传中“明年”所指为何年也重新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岂可简单地断为元延三年？如前所述，“明年”是论者确定《长杨赋》作年的主要依据，而《长杨赋》作年又是他们提出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假设的目的所在。既然《长杨赋》不一定作于元延三年，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提出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校猎的假说呢？既然成帝元延三年校猎的假说没有必要提出，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为了这个假说去否定和篡改《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呢？可见该说同样自相矛盾，不能成立。

既然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说不能成立，那么该说以对《成帝纪》批评为主要内容的解释也毫无道理。其一，该说批评《成帝纪》“并两事为一”。按这里的两事无疑包括他们所说的元延三年校猎。如上所述，元延三年校猎并不存在，因此所谓的两事实际上是一事，则他们对《成帝纪》的批评属于无中生有。通观本传可知成帝的确进行过两次校猎，前次载《校猎赋》，后次载《长杨赋》。但即使我们把论者所说的“两事”当作这二赋所表现的两次校猎，对《成帝纪》“并两事为一”的批评也不能成立。因为，如果班固真的“并两事为一”，将成帝两次校猎的有关内容合并为一，那么论者又到哪里去寻找这“两事”呢？如果这两事找不到，“并两事为一”又何从说起呢？可见这种说法本身就自我否定，不能成立。还是周寿昌《汉书注校补》说得好，“若谓下年事并书于上年作一事，断无此体例。试覆班书全卷，曾有一失否？”^③可谓至论。既然班固不会将时间不同的两事并为一事，那么对于时间、地点和性质都不相同的两次校猎，他更不会并为一事。比较《校猎赋》和《长杨赋》可知：时间上，前次校猎在冬“十二月”；后次在秋季，且“三旬有余”。地点上，前次校猎在“白杨”、“上兰”、“昆明”一带，属京兆尹长安县；后次在“五柞”、“长杨”一带，属右扶风的盩厔县。性质上，前次校猎以“游观侈靡，穷妙极丽”，“尚泰奢丽夸诩”为目的，不合“三驱之意”的规定，属成帝个人娱乐性的活动；后次校猎则不仅符合“为宾客”的规定，还具有强烈的对外军事威慑性，所谓“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其王侯”，显然属于国家大事（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由于成帝两次校猎时间、地点和性质都不相同，所以班固对扬雄的这两篇赋录而不并。由此可见，对《成帝纪》“并两事为一”的批评不能成立，实际的情况倒是论者一方面混淆了这两次校猎之间的种种差异，另一方面不了解《汉书》分

①钱大昕《三史拾遗》，《续修四库全书》，第454册，第925页。

②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15页。

③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续修四库全书》，第267册，第780页。

体纪事的体例。

其二，该说批评《成帝纪》“仅载”元延二年那次校猎，未载元延三年那次。既然元延三年校猎不存在，因此批评《成帝纪》“仅载”元延二年校猎同样是无中生有。如上所述，成帝确实有两次校猎。但即使我们把论者所说的两次校猎当作本传所赋成帝的两次校猎，批评《成帝纪》“仅载”其中一次校猎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本纪和列传是《汉书》的主要体例，班固用前者记载某一皇帝在位期间的国家大事，用后者记载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这是《汉书》分体纪事的基本体例。通观本传可知，扬雄不仅参与了成帝的这两次校猎，而且将之写成《校猎赋》和《长杨赋》两篇大赋，成为自己生平创作中的两件大事，故班固将之载入《扬雄传》。但成帝的这两次校猎，前一次属于个人娱乐，故不载《成帝纪》，而后一次属于国家大事，故载《成帝纪》：这完全符合《汉书》分体纪事的体例。相反，如果班固在《成帝纪》中将这两次校猎都载入，或者只载成帝个人娱乐性的校猎而不载属于国家大事的成帝从胡客校猎，那他倒是犯了大错。因为那表明他分不清国家大事和个人私事之间的区别，也分不清本纪和列传两种体例各自的功能和用途。班固不会也不可能那样做。然而倒是论者认为，这两次校猎《成帝纪》都应记载，而不应“仅载”一次，或“并两事（次）为一”。这正是他们对《汉书》分体纪事体例缺乏了解所致，岂能据之反诬古人？

可见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及其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成帝纪》元延二年成帝“从胡客大校猎”的记载不容否定，更不容篡改。考察《长杨赋》的作年必须以本传和《成帝纪》的记载为依据。由于《成帝纪》元延二年是对成帝从胡长杨大校猎的唯一记载，因此是确定《长杨赋》作年的唯一可靠史料。按本传载《长杨赋》序曰：“秋，命右扶风以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罟，捕熊罴豪猪虎豹豺獫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以网为周陆，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①本传言右扶风之民受命输兽在秋季，《成帝纪》则言成帝亲自行幸在冬季，时间上正好前后衔接。至于地点，都是位于右扶风的长杨，也是一致的。据此，可以肯定《长杨赋》所赋成帝从胡校猎之事发生在元延二年。赋中又言：“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云云，则《长杨赋》文本的写作也在元延二年当年。

二、成帝羽猎之年是否就是扬雄作《校猎赋》之年

既然《长杨赋》作于元延二年，而本传明言《甘泉赋》、《河东赋》和《校猎赋》作于《长杨赋》之前，因此关于这三赋作于元延二年的说法不能成立。不过，将这三赋系于该年，除了对《成帝纪》

元延二年成帝“从胡客大校猎”记载的否定篡改之外，该说还有一个前提，认为《校猎赋》与《甘泉赋》、《河东赋》为同年之作。其依据是这三篇赋的序，因为《甘泉赋》序曰“正月”云云，《河东赋》序曰“其三月”云云，而《校猎赋》序曰“其十二月”云云，前后通观，确实可以肯定成帝行幸甘泉、河东与羽猎三事发生在同一年。然而，是否可以因此认为：成帝这三事的发生之年也是扬雄这三赋的写作之年？对此，前述论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将之具体到元延二年。

将成帝的行事之年视为扬雄的作赋之年，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仔细分析扬雄四赋，可以发现其中三赋的作年的确就是成帝的行事之年。如《河东赋》曰：“伊年暮春，将瘞后土。”师古曰：“伊，是年也，谓是祠甘泉之年也。”说明该赋与先前的《甘泉赋》均属成帝行幸两地之年所作。又《长杨赋》曰：“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也直言此赋为成帝校猎长杨之年所作。不过，尽管这三赋的作年就是成帝的行事之年，但这三赋写作的具体时间与成帝行事的具体时间之间还是存在间隔的。因为《甘泉赋》序中明标“还奏”二字，《河东赋》与《长杨赋》二序中明标“还上”二字，说明这三赋都不是即兴之作，而是事后之作。尽管成帝行事之时与扬雄作赋之时之间存在间隔，但由于间隔不久，所以这三赋仍属成帝行事之年所作。

然而，如果要成帝的羽猎之年也视为扬雄《校猎赋》的作年，那就大错特错了。按《文选》卷9李善注《长杨赋》序中：“明年，谓作《羽猎赋》之明年，即（长杨）校猎之年也，班欲叙作赋之明年。”^②按这里的《羽猎赋》即《校猎赋》，因此“作《羽猎赋》之明年”就是“作《校猎赋》之明年”。李善特别注明，“明年”指的是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而不是成帝羽猎之明年：这就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区别开来。李善生活在唐代，比后人更有可能接触到扬雄作品和自序的原貌，因此他的注释当有据可依，不可忽视。按照李善的注释，“作《校猎赋》之明年”乃作《长杨赋》，而《长杨赋》作于元延二年，因此《校猎赋》当作于元延元年（前12）。既然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不同于成帝羽猎之年，按照先事后赋的常理，则成帝羽猎之年必在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以前，也即在元延元年以前。按《成帝纪》，元延二年前成帝并幸甘泉、河东二地的记载只有永始四年（前13）才有。如前所述，成帝羽猎与这两事同年，因此成帝羽猎也在永始四年，而《校猎赋》作于元延元年：可见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之间确实存在一年的间隔，两者不可混淆。

如上所述，扬雄在其他三赋中都标明它们属于事后年内之作。根据这个体例，如果《校猎赋》也

^①班固《汉书》，第3557页。

^②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页。

是年内之作，那么扬雄在序中和赋中也会有所标识。但通观《校猎赋》序及正文，均找不到这类标识，这实际上是从体例上说明此赋不是年内之作。又赋中曰：“仁声惠于北狄，武义动于南邻。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长，移珍来京，抗手称臣，前入围口，后阵庐山。”特别提到此次羽猎的影响，使得北狄南邻纷纷入朝称臣。这种立竿见影式的效果显然不是成帝一次羽猎就能取得的。但考虑到元延二年成帝从胡长杨大校猎的举动，那么不妨把这段文字看作是预写，即扬雄写作《校猎赋》之时，已经获悉胡人入朝的有关信息，故将之写入此赋，以强调大汉的声威。这些信息在永始四年成帝羽猎时显然不可能出现，但在元延元年则有可能出现。这些信息得以在《校猎赋》中出现，说明元延元年扬雄还在写作此赋，而这已在成帝羽猎之后一年。《校猎赋》内容和体例上的这两个事实再次证明了李善注释的正确性，因此扬雄“作《校猎赋》之年”并不是成帝羽猎之年，两者之间存在一年的间隔。

扬雄《校猎赋》之所以未能在成帝羽猎之年完成，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作赋本身极其艰辛，极费时日，形成扬雄《校猎赋》创作与成帝羽猎之间的必然间隔。按《西京杂记》卷2言司马相如写作《上林》、《子虚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忽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①《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写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②可见汉人作赋少则百日，多则十年，极其艰辛而又极费时日。扬雄也不例外，桓谭《新论·祛蔽》言其作《甘泉赋》：“为之卒暴，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③扬雄创作《甘泉赋》如此艰辛，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苦于精思，速度缓慢，正如本传所称“默而好深沉之思”；另一方面是因为《甘泉赋》在四赋中篇幅仅次于《校猎赋》，字数达一千五百余字。《甘泉赋》创作尚且如此艰辛，那么创作其中篇幅最长、字数多达一千七百余字的《校猎赋》自然会更加艰辛，也更加费时。由于创作的艰辛费时，使得扬雄创作《校猎赋》与成帝羽猎之间必然出现一个间隔，这个间隔使得扬雄《校猎赋》的作年有可能跨年。

如前所述，扬雄《甘泉赋》、《河东赋》与《长杨赋》写作的时间与成帝行事的时间之间也存在间隔，但这三赋的写作并没有跨年，而《校猎赋》则跨年。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如果这些间隔本身都达到或超过一整年，那么扬雄各赋的创作必然都要跨年。但如果这些间隔本身都不到一整年，那么扬雄各赋的创作可能跨年，也可能不跨年。在这种情况下，假定这些间隔相同（例如两个月），那么

各赋创作是否跨年就取决于成帝行事的具体月份。正是在这一点上，《校猎赋》与其他三赋区别开来。因为，成帝行幸甘泉在正月，行幸河东在三月，均属永始四年年初，所以该年还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可以保证扬雄在年内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的创作。尽管成帝从胡长杨校猎发生在元延二年初冬，属于年末，但年内毕竟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可以保证扬雄在年内完成《长杨赋》的创作。然而成帝羽猎偏偏发生在“玄冬季月”，即永始四年的最后一个月，除去猎前的准备时间和行猎的那一天，该月其余的时间扬雄即使全都用于篇幅更长的《校猎赋》创作，也不到一个月。这样扬雄在成帝羽猎当月就写成此赋的时间就极其有限，以至不得不利用其后的时间；而这只能利用下一年，即元延元年的时间了。这正是扬雄《校猎赋》未能在成帝羽猎之年完成的第二个原因。

这两个原因表明了扬雄作《校猎赋》跨年的必然性，而前述《校猎赋》本身内容和体例上的分析又表明了扬雄作此赋跨年的已然性。这两方面的论证都证明了李善注释的可靠性。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李注“作《校猎赋》之明年”很可能就是扬雄自序的原文。作为手握如椽大笔的史家巨擘，班固撰写《扬雄传》时不可能一字不落地照抄扬雄自序原文，必然有所删节，“明年”五字定语（“作《校猎赋》之”）可能因此被省略。作为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它导致了后人理解的偏差：将成帝羽猎之年当作扬雄作《校猎赋》之年，并进而认为成帝羽猎之明年即扬雄作《长杨赋》之年。幸而有李善之注保存了扬雄自序中这一重要原文，使我们得以澄清扬雄作《校猎赋》跨年的历史真相，并消除后人各种自相矛盾的误解。

总之，成帝行幸甘泉、河东与羽猎都在永始四年。既然《甘泉赋》、《河东赋》属于年内之作，因此它们作于永始四年。由于“作《校猎赋》之明年”乃作《长杨赋》，而《长杨赋》作于元延二年，因此《校猎赋》作于元延元年，与成帝羽猎并不同年。既然《甘泉赋》、《河东赋》与《校猎赋》分别作于永始四年和元延元年，因此将这三赋都系于元延二年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综上所述，将扬雄四赋系于元延二年和三年的做法有两个错误：一是以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为前提，二是对本传里“明年”二字理解有误，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混为一谈。只有充分尊重《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并认识到本传所说的“明年”并不是指成帝羽猎之明年，而是指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才能正确地考证出扬雄四赋的作年：永始四年（前13）作《甘泉赋》与《河东赋》，元延元年（前12）作《校猎赋》，元延二年（前11）作《长杨赋》。

（责任编辑：闫丽）

①《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②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7页。
③严可均《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8页。